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1.03.005

# 毛泽东民族形式概念形成的理论资源与历史语境

刘超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民族形式是毛泽东思想理论中的重要概念, 它有着非常复杂的理论资源, 从马克思、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到中国哲学思想, 都对毛泽东民族形式概念的形成产生了影响。推动民族形式概念产生的核心动力, 则是理论与现实层面的双重需要: 一方面, 以国民党三民主义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想走向僵化, 难以回应时代的需要; 另一方面, 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转向, 呼吁建立自己的民族主义理论。两者结合构成了毛泽东民族形式概念形成的历史语境。

**关键词:** 毛泽东; 民族形式; 民族主义; 理论资源; 历史语境

**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1)03-0030-06

**引用格式:** 刘超. 毛泽东民族形式概念形成的理论资源与历史语境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6(3): 30-35.

## Theoretical Resources and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Concept of National Form

LIU Chao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National form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the theory of Mao Zedong Thought, which has very complex theoretical resources.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concept of national form is influenced by Marx's and Stalin's national theories as well as Chinese philosophical thoughts. The dual needs of theory and reality i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form. On the one hand, the nationalist thought represented by the Kuomintang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is becoming rigid and difficult to respond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mmunist Party turned to nationalism in 1930s, call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its own nationalist theor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two constitute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formation of Mao Zedong's concept of national form.

**Keywords:** Mao Zedong; national form; nationalism; theoretical resources; historical context

围绕民族形式概念, 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艺界掀起了一场大讨论, 民族形式也成为了一个热

点概念, 频频出现在相关的理论文章中。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 毛泽东主要围绕民族形式

收稿日期: 2021-03-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经验研究”(18ZDA278)

作者简介: 刘超(1982—), 辽宁抚顺人, 湖南师范大学讲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概念建构自己的文艺思想。1942年之后，围绕民族形式的讨论，五四新文学传统与延安文艺传统逐渐合流。梳理20世纪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历程，绕不过民族形式概念。过往针对民族形式的研究不少。近几年，随着民国时期大量新资料被整理了出来，学界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转向也有了新的认识。基于新的理论背景，民族形式的复杂理论资源、形成过程中所回应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等等内容，就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与澄清了。

### 一 民族形式概念的理论基础

民族形式概念的理论来源是什么？针对这一问题，学界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它是从陈伯达、艾思奇等人那里借用的概念，还有学者认为它是借鉴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而来的，也有人认为它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

韩国学者金良守认为，毛泽东的民族形式概念主要借鉴了陈伯达的思想，其依据是：首先陈伯达1938年5月写了《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7月又写了《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两篇文章均论及了民族形式问题。毛泽东最早使用民族形式概念则要到1938年10月的《论新阶段》一文。时间上陈伯达的文章在先。其次，“1938年9月，在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其发起人当中有毛泽东、陈伯达、艾思奇等人。以此推想，当时陈伯达、艾思奇与毛泽东之间应该是有观点交流的，其内容反映到《论新阶段》的可能性是充分的。另一方面，陈伯达与毛泽东的个人的关系之密切，那可能性则更大。”<sup>[1]</sup>

金良守的观点遭到了中国学者石凤珍的否定。石凤珍认为：“首先，其结论措辞不妥当，明显有毛泽东‘把他人的成果据为己有’之嫌；其次，主要凭借使用‘民族形式’术语的‘时间’先后，以及陈伯达当时任毛泽东秘书这一‘人际关系’作为‘民族形式’命题所属和概念定位判断的依据，而不是从‘民族形式’的来源、各自对‘民族形式’的理解和实际运用效果角度分析考察，无疑具有简单化的判断倾向，结论亦失之偏颇。”<sup>[2]</sup>

石凤珍认为，毛泽东的民族形式概念是借鉴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而来的。她强调：“斯大林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形式’理论，早于1937年就已

经被《中苏文化》杂志介绍到中国，毛泽东从中苏文化协会主办的刊物《中苏文化》杂志当然可以看到（杂志还曾经向毛泽东约过稿）。另外，从进入延安开始，毛泽东集中精力阅读了大量马列原著，对斯大林1925年就已经提出的‘民族文化’理论完全可以有所了解认识。”<sup>[2]72</sup>

郭沫若认为中国的“民族形式”与苏联的有所不同：“‘民族形式’的提起，断然是由苏联方面得到的示唆。苏联有过‘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号召。但苏联的‘民族形式’是说参加苏联共和国的各民族对于同一的内容可以自由发挥，发挥为多样的形式。目的是以内容的普遍性扬弃民族的特殊性。在中国所被提到的‘民族形式’，意思却有些不同，在这儿我相信不外是‘中国化’或‘大众化’的同义语，目的是反映民族的特殊性以推进内容的普遍性。”<sup>[3]</sup>郑伯奇认为：“若将民族形式照苏联方面的解释，那么，在中国，民族形式可能发生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方面当然是全中国范围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国化’运动……另一方面应该是指各‘边疆民族’的传统形式。”<sup>[4]</sup>在20世纪40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中，很少有人会直接将毛泽东的民族形式理论嫁接到斯大林的民族理论之上。

1938年之后，围绕民族形式问题掀起了一系列的论争。在论争中，一些学者将民族形式问题的缘起追溯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如在胡风看来，没有创作出“新鲜活泼的”、具有“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作品，“正是因为现实主义的方法没有被作家融化成像它所要求的那样在活的形象上认识（表现）今天这样丰富的现实的能力。”<sup>[5]</sup>胡风认为：“‘民族形式’，它本质上是‘五四’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新的情势下面主动地争取发展的道路。”<sup>[5]446</sup>当代学者较少讨论民族形式概念的现实主义传统，更多强调文艺民族形式与文艺大众化的内在联系。

建构民族形式理论的过程中，可以肯定，毛泽东吸收了多方面的理论与思想资源。1939年2月1日，陈伯达写了《墨子哲学思想》一文，毛泽东致信陈伯达<sup>[6]108</sup>；2月20日，他又致信张闻天，对陈伯达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提出商榷意见<sup>[6]112</sup>。可见毛泽东民族形式概念的确受到了陈伯达等延安学者的影响。作为一代共产党人的代

表,毛泽东必然也熟读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的书论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不仅做过多场与马列思想相关的公开讲座,还写作了《矛盾论》《实践论》这类独具特色的著作。同时,毛泽东也是亲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代,读一下他的《体育之研究》(1917)、《民众的大联合》(1919),可以很容易发现五四精神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可见,民族形式概念的确有复杂的话语与思想资源,但在缺乏直接的证据情况下,贸然以因果逻辑将民族形式概念与某一方面的理论资源绑定在一起,绝对是不妥当的。更重要的是,民族形式概念是特定的历史语境与个人思想碰撞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其首先是在理论层面推进了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思考,其次是回应了共产党民族主义转向之后的遗留问题。

## 二 民族主义浪潮下的民族形式概念

毛泽东的民族形式概念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嵌入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与民族主义思想之中的。鸦片战争以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蒋介石、胡适等民国政治家、思想家均对民族主义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但最终被民国时期的执政党认同并被奉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中的民族主义思想。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具有三个特征,其中蕴含了一系列理论问题。

第一是以“民生主义”为中心。在孙中山看来,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就是“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sup>[7]184</sup>。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sup>[7]355</sup>。戴季陶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要阐释者,曾经着重指出,“民生主义实在是先生全目的所在。”<sup>[8]</sup>民生主义的优点是切合实际需要,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但由于其目标过于实际,使得其挤压了理想主义存在的空间,缺乏超越性的向度,不利于调动民众的积极性。

第二是以“国族主义”为本质。“用一句简单话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sup>[7]238</sup>“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这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实在的。”<sup>[7]238</sup>孙中山认为中国想要恢复民族主义精神,一方面要

有危机意识,另一方面是善用家族、宗族这些固有团体,这样才能结成更大的国族团体。实际上,利用传统社会组织架构,社会革命的成本更低,也有利于团结旧势力,但可能因此疏远新兴社会力量,例如无产阶级,而且顽固的旧势力也会阻碍后续的政治经济变革。

第三是“种族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特征。孙中山认为民族起源于五种力: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其中血统居于首位,其理论具有种族主义倾向。文化保守主义与种族主义常常相伴出现。孙中山认为要维持国家民族的长久,需要依靠传统道德,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除了恢复传统道德,传统的知识与能力也应恢复,其具体内容就是《大学》中言及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孙中山那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被放到了最后。

孙中山的民族理论在现实性与超越性、旧社会势力与新社会力量、固化的种族主义与可建构的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与现代科学文化这几对范畴中做出了自己的取舍。这种取舍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急剧变化,这种取舍的负面影响逐渐加大。20世纪30年代颇有影响的国民党前锋社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几乎全盘继承了孙中山的民族理论,甚至更加极端与绝对化,在前锋社看来,“民族是一种人种的集团。这种人种的集团地形成,决定于文化的、历史的、体质的及心理的共同点,过去的共同奋斗,是民族形成唯一的先决条件;继续的共同奋斗,是民族生存进化的唯一先决条件。因之民族主义的目的,不仅消极地在乎维系那一群人种底生存,并积极发挥那一群人底力量和增长那一群人底光辉。”<sup>[9]</sup>显然,在前锋社这里,孙中山民族理论中剩余的少许的开放性也被放弃了。

毛泽东为主导的共产党民族主义思想与孙中山代表的国民党民族主义思想恰好形成了对照。

首先,毛泽东的民族主义理论是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产生的,是充满现代性的民族理论。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是中国式的,也是特殊的新式革命。他认为,其“新”在于过往的资本主义革命是本国的无产阶级反对本国的资本家,而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其反对的不仅有国内的资本家,更重要的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因此,中国革命是

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具有国际意义。

斯大林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sup>[10]</sup>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sup>[11]</sup>。就界定民族本质的路径而言，前者偏向寻找客观的社会历史元素，后者偏向主观的文化情感建构。毛泽东的民族理论吸收了斯大林的一些观点，例如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自决的观点，但就整体来看，毛泽东的民族主义理论看重通过民族形式建立新民族文化，其充分考虑了主观定义与客观定义之间的差异，是非常“现代”的理解民族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看到：“（毛泽东）他对他正努力创建的革命联盟的想象，倒很像 60 年代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新左派’的想象。”<sup>[12]</sup>

其次，毛泽东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本质是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融合，其始终为理想主义者保留着想象空间。毛泽东认为：“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sup>[13]521</sup> 这是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它重新界定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消解了两者的对立。“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sup>[13]521</sup> 日本侵华是得到了日本普通民众支持的，普通民众也是受益者。彼时，整体的民族利益，远远超出了阶级矛盾，对外战争本身就是日本缓解阶级矛盾的方法。毛泽东自己也说：“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的利益。”这实际上就是将民族利益放到最高的优先级。中国如此，日本如此，苏联也是如此。

毛泽东承认国际主义的合理性。列宁讨论民族文化问题时，明确表示了国际主义的立场：“民族文化的口号是资产阶级的（而且常常是黑帮-教权派的）骗局。我们的口号是民主主义的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各民族共同的文化。”<sup>[14]</sup> 在列宁看来，每一个民族内部都有两种文化，一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文化，一是不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资产阶级的惯用手段就是将自身的资产阶级文化冠以民族文化的名称，用以掩饰阶级矛盾的事实。后续的斯大林补充强调：无产阶级当政时候，民族文化的口号就是无产阶级的

口号。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主义的态度，基本沿袭了列宁、斯大林的观点。毛泽东将自己的民族理论命名为新民主主义，以民族形式概念绕过列宁重点讨论的民族文化，处处可见对列宁观点的应和，但是，毛泽东在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终究是选择了民族主义一方。毛泽东虽然将自己的理论称为新民主主义思想，但实际上是一种独特的符合中国现实与时代需要的民族主义理论，是围绕着民族形式建构的理论体系。毛泽东反复强调的是，必须结合具体的民族形式以及中国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才能发挥作用。

第三，关于“民族形式”的论述是毛泽东民族主义思想的独特理论创造。毛泽东认同共产党员的基本立场终究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本人就是外国的思想家。共产党员向民族主义的转向，最终只能采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式，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定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sup>[13]534</sup>。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强调：“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sup>[16]663</sup> 新文化必须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更具体地说，新文化应该是国际主义的内容与民族形式的融合。

同时，借由“民族形式”建构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sup>[15]708</sup>。不同于孙中山对中国民众“奴性已深”的判断，毛泽东与共产党人更看重群众的力量，认为必须引导文化潮流，或者说夺取文化领导权，才能影响群众。因此，毛泽东认为：“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sup>[15]706</sup> 也就是说，新的国民文化，首先，其领导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其次，其核心特征是人民大众性，最后，其具体内容则是反帝反封建。毛泽东甚至与葛兰西一样，不谋而合地看到了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的重要性。1939 年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三点作用：“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sup>[16]</sup> 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引导人们以新的眼光看历史。他提出，“对于人民群众和

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sup>[15]707</sup>。这样,才能使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妥善融合,绕开文化保守主义的陷阱。

从学理逻辑上可以看出,毛泽东代表的共产党民族主义思想与时代的契合度更好,其更好地回应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以此为基础,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文艺思想才最终取代国民党的相关思想,成为了抗战时期的主流。

### 三 民族形式概念的现实基础

毛泽东民族形式概念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其针对现实问题建构理论话语,而非一味追求逻辑的圆融无瑕。共产党克服左倾错误,转向民族主义潮流,致力于组建抗日统一战线,后续必然要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建构共产党自己的文艺思想。这一过程必须充分考虑三个方面的现实挑战,民族形式理论正是产生于多方挑战所形成的张力场域之中。

首先是国民党的挑战。民族主义是国民党三民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党人的民族主义转向容易被误解为向国民党的妥协。共产党人在建构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理论时,必须要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理论有所区别。

其次是共产国际的挑战。作为共产国际的分支,中国共产党不能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思想理论以及国际主义的立场,因此在建构共产党自己的民族主义理论时,必须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相互融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反复强调的正是“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只有政治上糊涂的人,或者必有用心的人,才会瞎说我们做得不对,瞎说我们抛弃了国际主义”<sup>[13]521</sup>。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是来自大众的挑战。国民党已经高举了十几年的民族主义旗帜,却没有取得一呼百应的效果,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推行的法西斯主义的民族主义更是不得人心。胡适就直白地说:“我不信中国今日有能专制的人,或能专制的党,或能专制的阶级。”<sup>[17]</sup>胡适认为,只有容错率高的不需要什么杰出人才的民主宪政才适合我们这种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作为国民党文化思想领袖的胡适尚且对蒋介石政府的民族

主义理论不满,那些一般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以国民党为戒,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思想不仅要与国人的民族情感形成共鸣,而且还应具有现实的调动能力,即其可以调动社会的各个阶层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毛泽东是围绕民族形式概念回应各种挑战的。首先,在思想理论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本质不同在于,共产党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思想为理论依据与指导。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sup>[13]534</sup>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绝对不能丢,高举这面旗帜,自然就与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理论区别开来了。另外,自孙中山开始,国民党文人谈民族问题时常用民族文化概念,民族形式的确在词汇上与民族文化也不同。

其次,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中国人创造的理论,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就是坚持国际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看作内容,将民族语言与文化看作形式,两者就有了结合的可能。另外,民族形式概念在列宁、斯大林的文章中多次出现过。以民族形式为核心概念,也便于将理论源头接到列宁、斯大林的相关论述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直接引用了斯大林的文章。

最后,毛泽东谈到民族形式的时候,特别指出它应该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sup>[13]534</sup>,强调基于民族形式形成的新文化应该具有感染力与现实影响力。1938年4月,毛泽东出席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中国的使命和作用。”<sup>[6]62</sup>

更具体地说,民族形式取得大众影响力的过程,也就是其不断下沉,最终成为一个准文学概念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与民族形式概念相关的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涉及重庆、桂林、香港、延安等多个地方,催生了200多篇文章的文学民族形式问题论争。这次论争的核心问题就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什么。

从陈伯达以及后来艾思奇对旧文化与文化形式的肯定,到萧三对中国传统诗词歌赋和民歌民谣、罗思对中国传统绘画技法、柯仲平对中国旧

戏的认同，构成了理解民族形式的早期形态，即将艺术的民族形式等同于中国艺术的传统形式，民族的就是过去的、旧式的。第二种观点是将五四以来的艺术新形式嫁接到民族形式上。葛一虹提出“我们的新思想与新感情当然是不能通过旧形式而表达出来的”<sup>[18]</sup>，因此不能忽视五四以来新艺术的诸多成就。胡风也是从继承“五四”传统的角度看民族形式问题的。第三种理解是将民族形式等同于民间形式，比如以向林冰、黄绳为代表的一派就认为，“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sup>[19]</sup>

将民族形式等同于旧形式，体现不出共产党文艺理论与政策的独特性，因为国民党文人也是鼓吹旧形式的；而与五四艺术传统嫁接，又容易滑入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罗网。利用民间形式，则必须提高民间形式的艺术水准，使其成为艺术主流。围绕民族形式产生的理论难题，1942年，在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毛泽东以“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为核心回应了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问题。在他那里，当艺术的指向转为工农兵之后，共产党文艺理论的独特性也体现了出来。顺着这个路径引出的普及与提高问题，以及后续一系列的文艺实践，又回应了民间形式水准不高、在过往居于艺术主流之外的问题。

概言之，毛泽东民族形式概念吸收了多重理论资源。这些理论资源在毛泽东思想中整合蕴酿，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与现实问题中，逐渐以具体概念命题的方式被引导出来。从外在看，三民主义为代表的民国主流民族主义思想已经难以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从内在看，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转向也呼求建立共产党自己的新民族主义理论。因而，毛泽东的民族形式概念既是个人思想的结晶，也是时代召唤的结果。

#### 参考文献：

[1] 金良守.论“民族形式”论争的发端问题[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6(2):52.

- [2] 石凤珍.文艺“民族形式”论争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72.
- [3] 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G]//徐乃翔.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315.
- [4] 郑伯奇.关于民族形式的意见[G]//徐乃翔.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488.
- [5] 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底提出和争点[G]//徐乃翔.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445.
- [6] 逢先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北京文献出版社,2002.
- [7] 孙中山.三民主义[M]//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
- [8] 戴季陶.孙文主义的哲学之基础[M].上海:民智书局,1925:15.
- [9] 佚名.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J].前锋月刊,1930(1):1.
- [10] 斯大林.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斯大林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286.
- [1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
- [12] 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794.
- [13]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4] 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25.
- [15]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6]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M]//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18.
- [17] 胡适.再论建国与专制[J].独立评论,1933(82):4.
- [18] 葛一虹.关于民族形式[M]//徐乃翔.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179.
- [19] 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G]//徐乃翔.文学的“民族形式”讨论资料.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194.

责任编辑：黄声波